第一部分
演講

© 2019 香港城市大學

© 2019 香港城市大學

一、當前中國社會政治思想狀況

在河南信陽公民社會與現代思想論壇上的演講 *

非常感謝王繼軍書記邀請我到平橋來談談我對當前中國社會政治思想狀況的認識。我研究理論是比較早的，1983 年到人民大學，與王書記也是校友了。1986 年開始讀博士學位，1989 年風波以後我就下海經商了，到今天仍在做藝術品投資與推廣方面的工作。對於理論研究，我現在只能說是票友了，已經不是我的專業了，寫文章只是業餘的兼職。為什麼今年以來我又出來寫了一些東西呢？其實從 2003 年起，我就給自己定了一個任務，一年寫一篇文章，主要是對中國歷史和現實中一些大問題的思考。從今年開始，我面向網絡寫作，寫了一系列關於中國現實問題的文章。主要有兩個系列，一個是「關於中國下一步」的系列思考，現在已經寫到第七篇了。還有一個是重慶事件持續發酵，社會廣泛關注，我就寫了一個「回望重慶」系列，現在已經寫到第五篇了。這兩個系列的文章都發表在「共識網」，這是一個國內影響很大的思想網站。我的文章發表後，在社會上也引起了一些反響，有些人都在問：榮劍是誰呀？

其實我在 1989 年以前寫了大量文章，特別是在當時著名的《世界經濟導報》上關於「新權威主義」的討論，就是由我和吳

* 2012 年 5 月 15 日，我接受河南省信陽市平橋區區委邀請，在該區主辦的「信陽公民社會與現代思想論壇」上，作了主題演講，根據演講錄音稿整理成文，稍有刪節。

© 2019 香港城市大學

稼祥首先開始唱對台戲的，由此引發一場大討論，我是主張民主的。自那以後 20 年間，我沒有介入理論界的是是非非。這一次我突然冒了出來，也引起了我們平橋區領導的關注，王書記費盡周折找到了我，我也很驚奇，也願意來和大家交流。對於市縣兩級幹部，我接觸的還是比較多的。我始終有一個觀點，中國市縣一級幹部的政治智慧是高於我們九個常委的！不是說笑話，我們大家對現實都不滿意，希望常委有大智慧，拿出高招來，可他們遲遲就是拿不出來。這一方面是體制問題，但我認為人到一定位置後智慧是下降的，我在後面會談到這個問題。

雖然 20 年沒有寫什麼東西，但我的文章出來後，的確引起了思想界比較大的反響。我最近寫了一篇〈奔向重慶的學者們〉，在「共識網」上點擊率達到了六萬多次，加上轉發，看到的人就更多了，而且美國所有中文網站都轉載了這篇文章。我由此感受到網絡傳播的力量。以前我在《中國社會科學》這樣高端的學術雜誌上發表長篇大論，讀者可能只有幾百個。網絡讀者廣泛，是吸引我寫作的一個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從年初我在網上發表第一篇文章時，我感到在這個時候應該出來講一些話了。之前的 20 年，大家都在看中國現行制度能運行到什麼時候，它的效率會發揮到什麼程度。小平主張不爭論，結果大家都埋頭幹事，先掙點錢再說。當然，社會問題也沒有充分暴露出來，各方利益大致平衡，彼此相安無事吧。但最近幾年感覺到社會問題逐步積聚，危機加深，尤其是 2011 年年底以來，大家都感覺可能要出事，都有一種緊迫感，好像時不我待。薄熙來去重慶時就講自己已經 62 歲了，沒多少時間了。的確，對他們這批政治人物來講可能就只有十年時間了，過了十年，他的理想抱負就沒機會實現了。比如劉源去年也非常活躍，通過他的智囊張木生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反響也很大。對此，我也寫了一篇文章〈重返新民主主義是否可行？〉我自認

© 2019 香港城市大學

為是很重要的文章，也引起了相當大範圍的反響。以前從來沒有見作為軍隊將領的劉源對國家發展戰略發表什麼意見，去年卻非常高調地講話。張木生的《改造我們的文化歷史觀》反映了劉源的許多看法。共產黨可以挖掘的資源都挖得差不多了，這些資源在現實中能發揮多大的效率，大家對此都有看法，很多的話已經講不下去了。在這個時候，劉源覺得新民主主義還可以講，可以用這個理論來凝聚大家的思想，可以來重塑執政黨的合法性。因為大家都知道共產黨腐敗到這個程度，還有什麼合法性呀？你在枱面上講的是一套，下面幹的是另外一套。這種政治人格的分裂是長期形成的。現在黨內有一批人想改變這種狀況，你共產黨做的與說的差距不能這樣大。比如學雷鋒吧，我也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叫〈中國的道德之困〉。文章提到，李鵬的女兒自己穿了價值幾萬塊的名牌衣服，居然說要給老百姓建立道德檔案，要大家過勤儉節約的生活——這不是荒唐嘛！在這種情況下，執政黨內部還是有一部分人在考慮這個問題——我們黨怎樣轉型，怎樣改革，才能重新擔負起領導的責任，而且是合法有效的，是正當的，是能夠得到人民擁護支持的？這個問題涉及到很多制度上的建設。

回到前面的問題，我為什麼出來說話？有我個人的理論偏好問題，其實有更多的人也在思考現實中的問題。有些人的出發點可能會更高尚一些，就是考慮執政黨怎麼改革，考慮國家的改革怎麼推進的問題。30 年改革以後，中國的確面臨着轉型問題。目前這個問題還沒揭開蓋頭，在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各種傳言此起彼伏，有些說法還非常離譜。在這種氛圍下，作一些思考，做一些理論準備，我看都是必要的。我今天給大家的演講，就是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對當下一些關注度比較高的問題的探討。

我今天給大家談的話題是「當前中國社會政治思想狀況」，主要會涉及到「當前」、「中國」、「社會」、「政治」、「思想」五方面的問題。這些話題都非常大，與我們的工作生活相差很遠，能給大家什麼啟發，都不好說，而且我講的都是個人的看法，和你們宣傳的黨的意識形態是不同的。我在讀書的時候就有一個說法，叫「研究無禁區，宣傳有紀律」，我講的東西與你們宣傳的調子是完全不一樣的，錯的地方可以批評。

關於當前的「時代性」

先講「當前」，一個關鍵詞：時代性。我們處於一個什麼時代？要有一個基本的判斷。中國有句古話叫「天不變，道亦不變」。「天」是一個什麼概念呢？「天」簡單地講，就是時勢，而「道」則是施政綱領、治國之道吧。從現在來看，我們今天所面臨的一個大的時代環境已經發生了很多變化。這就需要我們對目前所處的時代有一個清晰的認識，而對於時代的把握是執政黨制定政策的一個基本前提。

毛澤東在他那個時代經常批評下面的幹部是小腳老太婆，趕不上時代的步伐。他的時代概念是要求社會的發展盡可能地超越現實，他一系列左的認知都是來源於對時代的錯誤判斷，比如要「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等。劉源在重提新民主主義理論時，就認為毛澤東在 1953 年以後提出總路線，放棄了「新民主主義要搞十五年」的既定方針，急於進入社會主義。這說明一個什麼問題呢？說明毛對當時的時代判斷是錯誤的，儘管他認為我們的黨要緊緊跟上時代的步伐。

改革開放以後，鄧小平對時代的判斷有一個調整。鄧對時代的基本估計是認為中國處於一個和平發展的時期，工作的重

© 2019 香港城市大學

心是發展經濟，不能對外打仗，要韜光養晦。基於這樣一個認識，制定了改革開放的基本路線。

到江澤民執政時期，又提出了「與時俱進」和「三個代表」。「三個代表」是在 2000 年「七・一」講話提出來的。在我看來，「三個代表」包涵了與世界文明全面接軌的基本考慮。「三個代表」提出後，當時的左派在北京聯絡了一批人，連續發表了五六個萬言書，對江的思想路線作非常尖銳、全面的批評，認為江的路線實際上是戈爾巴喬夫式的修正主義路線。江當時提出「三個代表」以後，實際上沒有繼續往前走，遇到阻力後又退回去了，結果導致左右兩邊對江都不滿意。「烏有之鄉」網站對江的批評是指名道姓的，當然也批評鄧小平。我的一個朋友蔡霞是中央黨校的教授，思想非常開放，她現在重新宣講「三個代表」理論，認為這個理論所具有的價值沒有被充分了解。我非常同意她的看法，就是說「三個代表」理論的意義沒講明。「三個代表」理論，說穿了就是要用社會民主主義來改造我們的黨，進而確定我們的改革路線。按照左派的批評，「三個代表」就是要搞「全民黨」，私營企業家也可以入黨，資本要素獲得報酬就是資本主義。江的理論提出以後，引起了黨內巨大爭議，但沒有繼續往前走。我認為江缺少鄧的權威，也缺少歷史的擔當和勇氣。我在寫文章時提到，我們改革 30 年有三個理論版本：一個是鄧的理論，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是「黑貓白貓」論的升級版，實質是實用主義路線。一個是江的「三個代表」理論，是要與世界文明接軌，往普世價值靠攏。一個是最近十年的科學發展觀。

在我看來，科學發展觀是工具理性的概念，不是一個價值理性的概念。工具理性是從技術的角度來看待發展，設計發展方式，而價值理性涉及到發展好壞的價值判斷。實際上科學發

展觀迴避了價值理性的分析，只是一個平衡的概念，統籌兼顧的概念。當然這個有一定的道理，因為我們前 20 年的發展有一定的偏頗。現在提出科學發展，要強調平衡協調，人與自然、人與社會、效率與公平等要平衡和諧，這是對的。但我們有一個問題：我們一再提和諧維穩，為什麼還一再出問題，而且問題的總量是要超過前 20 年？為什麼你愈想穩定，社會愈穩定不下來？這就說明我們制度存在很多問題。對於這些問題你不能採取鴕鳥政策。

對改革 30 年作一個評價和反思，這篇文章還沒開始做，執政黨做不做，還不好說。從研究的角度看，鄧絕對是開創性人物，他開闢了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儘管他有這樣那樣的問題，比如八九事件，歷史以後會有評價的。1992 年小平南巡講話重新推動了改革，歷史作用非常大，是無可置疑的，是可以蓋棺論定的。1992 年我剛好在深圳，大家都一片茫然，上下都是反和平演變的調子，哪有搞經濟的氣氛呀？但是小平講話一下子就把勢頭扭轉過來了。在第二個十年，就是江的十年，他有就政治體制改革方面作考慮，但走了半步就退回去了，這註定他不能成為像鄧那樣的歷史性人物。然後是最近十年。對這三段，就我來看是一段不如一段，這也是目前理論界的一個非常普遍的看法。最近十年有哪些理論問題解決了？都沒有。對於有些理論問題，用開玩笑的話講，就是「打死也不說」，更談不上做了。另一個問題就是最近的十年是不是停滯的十年？當然我們做了許多事，辦了奧運會，高鐵也上來了，航空母艦也有了，殲 –20 也有了，極大地滿足了中國人關於中國重新崛起的想像。第三個十年剛開始時，大家都不看好，2002 年美國有個華裔律師章家敦寫了一本書叫《中國即將崩潰》，轟動一時，排到了美國暢銷書的前幾位。2003 年中國出現「非典」，處於最低潮，外人以為中國馬上就完蛋了，但年底就起來了。經過

© 2019 香港城市大學

2008、2009 年的金融危機，中國制度的有效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釋放。現在外國人操心的不是中國即將崩潰，而是中國即將統治全世界，如英國人馬丁·雅克（Martin Jacques）寫了《當中國統治世界》，調子完全翻了過來。現在老外不給中國人說點好話，一是拿不到錢，二是你不了解中國啊。中國經濟總量的變化恰恰是在這十年裏發生的。按道理講，我們對這十年應該有一個很高的評價才對，你說這十年是停滯的，你不是不負責任嗎？實際上，我說的「停滯」，是我們對未來的發展沒有一個清晰的方案，沒有提出一個思路——這也是左右兩邊都對十年不滿的原因。對目前中國這種不計代價的、對資源掠奪式的發展，它的可持續性怎麼樣，都沒有一個冷靜的反思。這是我們討論十年發展的切入點。如果單看表面的東西，中國已經是一個超級大國了——現在歐美都是這樣看中國的。按照現在的發展速度，到 2020 年我們就應該是世界第一了。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我們怎麼可能超過美國呢？這十年除了經濟上的發展格局，還有就是政治制度的改革，我們對未來的政治作了一個什麼樣的安排？

做了 30 年的回顧，又回到了我們所說的「當前」。我們所處的時代究竟是一個什麼時代？時代特徵是什麼？為什麼我們有一種時不我待的改變要求？我們如果不往前走，我們過去取得的成績很可能會成為一個巨大的包袱。我們的時代有兩個根本的特徵，一個是「全球化時代」，一個是「互聯網時代」，全球化和網絡化是我們時代的總特徵。這麼說，大家可能認為與《人民日報》的社論沒什麼兩樣，的確如此。那麼在這兩個特徵下，我們的制度如何安排呢？因為我們會遇到傳統的方式、傳統的制度手段解決不了的問題。比如維穩問題。過去哪一個村莊出了問題，可以派一個連把它摁住，而且外界沒人知道。現在怎樣？一個小事發生，一條微博發出去，全中國、全世界都

知道了。比如我要到信陽來講課，我就注意到了有關信陽的一條微博，就是有關招聘處女採「口唇茶」的事情，全中國都知道了。這在以前是不可能發生的，現在瞬間就可能發生蝴蝶效應，互聯網迅速放大，你沒法控制。

中國是全球化的兩個最大的受益者之一，還有一個是美國。這要充分肯定江朱時期我們加入世貿的重大決定。當時朱鎔基到美國去談判，回來就有人罵他是賣國主義，罵他把所有的門都打開了，外國的東西都比中國便宜，中國的工業和農業還不垮掉？現在再看，遠不是那麼回事。全球化時代，市場開發，資源共享，我們有豐富的資源，加之大量的廉價勞動力，使我們迅速在全球化格局中佔到有利地位。現在的問題是什麼呢？是我們享受到全球化的經濟紅利後，為什麼對全球化的政治紅利和文化紅利全面拒絕？這就是問題所在。你能不能拒絕？世貿組織、世界貨幣組織等都有一套制度安排，我們都是執行的。雖然在政治是沒有一個統一的規則，沒有要求各國必須執行民主制度、三權分立制度，但在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實行這一套制度的情況下，我們是拒絕的。我們的委員長講了，我們有五個或六個「不搞」，「三權分立不能搞」，「聯邦制不能搞」等——現在據說是把話收回去了。這些「不搞」顯然是與世界政治文明的主流背道而馳，你也不要說得那麼絕嘛，你可以研究嘛。這就是我們的時代，我們全球化的經濟紅利拿到了，政治上紅利能不能拿到？如果我們參與進去的話，我們是可以拿到的。我們老是擔心，如果我們參與到民主化進程中，共產黨的傳統優勢會失去，就不能取得目前的統治地位了。這些擔心是有道理的，但你拒絕這個東西行不行呢？我的看法是：你參與進去，不但拿到經濟紅利，還可以拿到政治紅利，這是多好的一件事情呀！

© 2019 香港城市大學